

降大任 著



論新山遺元

新	天
論	遺
丁卯年冬 張頌題	山



B 583830

515
元 遠 山 新 论
降 大 任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开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75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750册

*

ISBN 7-5378-0099-5

1.96 定价: 3.20元

封面题字：袁旭临

封面设计：杨茂春

责任编辑：胡晓青

自序

年轻时读元遗山慷慨悲凉的诗句，很受感动，却从未想到要研究元遗山。在读古诗也被指责为吸收封建主义遗毒的年代，读已经是犯忌，哪里有研究的条件和可能。尽管也不免看到报刊上发表零星研究遗山诗歌的文章，觉得那只是个别老先生才有资格去写，属于网开一面的特例。年轻学子是不应仿效、去耗费精力的。事实上，凡是致力于古代文化研究事业的人，那时均不免成为大批判矛头指向的明显的或潜在的靶子。在好学上进的青年来说，从古书中讨学问不是正路，而是将被逐步淘汰的旧意识的表现。倘若贸然效尤，很可能变成“封资修的孝子贤孙”，丧失作人的权利。已经被扣上“白专道路”帽子的我，谈遗山诗或其他古人著述便是罪状，遑论研究！这种提心吊胆的心理并非无因，“文革”十年，终于看到了现实教训。从古书中讨学问的老先生们统统成了“黑帮”，扫进“历史垃圾堆”。由于涉世浅、年纪轻，我个人虽未受“揪斗”的冲击，保住了大学毕业后的“饭碗”，却始终在指令去划清那永远划不清的同修正主义的界限，背上卸不下那只无形的反动的“黑锅”。

实在说，我并非嗜古如命，单喜欢从古书中讨学问。只是觉得读古诗是一种消遣性的学习，有些兴味而已。不是说无产阶级

• 1 •

文化应当吸收前人精神遗产的精华吗？不学习，怎么吸收？从哪里去吸收？这问题，教人实在弄不明白。凡是倒行逆施的东西，终究不能长久。及至四害清除，拨乱反正，一切真相大白：不仅读古诗没有错，而且从事研究更应当得到肯定、称赞。于是，我又想起了元遗山。

这回已不限于欣赏元遗山的诗了，而是下决心去研究一下。当然，这个动机的产生也有客观条件。一是我从1980年10月结束了在西藏日报社的工作，调回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当这里学术刊物的历史编辑（有时也编文学稿件），打算选个业余科研的题目，充实自己；二是元遗山是历来探讨较少的历史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何况他又是我乡里的先贤。研究他既能显出科研工作的地方特色，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义，谁不知道元遗山是历史上金元之际的文坛盟主呢？兴趣和条件，推动我选中了元遗山这个研究题目。这个工作开始于1983年后半年，首先要干的是读书思考，再陆陆续续写文章，而且从1985年起，还在《晋阳学刊》开辟了“元好问与金元文化研究”专栏，以期在省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视，得到响应。

刊物上的专栏确实发生了影响。两年多来，以山西为主，国内学术界研究元遗山及金元文化，已蔚成声势，成果可观。1985年9月在遗山故乡山西忻州市召开全国元遗山研究学术会议，便是明证。这是学界诸公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敢掠美，只敢说，个人对推动这一研究的开展尽了微力而已。反过来，再谈自己的研究。我以往对遗山所知甚少，无非是读了他几首诗，也只知道他著名的《论诗绝句》。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下手呢？我采取的方法是了解全貌、突破重点，在这个基础上，选出专题，逐步拓展。要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知道遗山几首诗显然是不行的。研读有关

遗山研究的著述文章，我发现谈论诗文及其史学成就者居多，全面评价者很少，而且比较浅略。由于我一向主张研究学问要避熟就生、人弃我取，所以从全面评价着眼，我打算从弄清有关元遗山的气节问题入手。

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大节有亏，并不等于学问文章便无价值。从事科研，不可只执一端，因人废言。但是，如果大节很坏，那文章学问的价值是不是要贬值？不是说对人的评价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吗？但这讲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能否施诸学问文章的评价呢？我觉得不能死套，既要注意政治与学问文章的区别，也要注意其间微妙的联系。然而，对历史人物如遗山来说，他在金元易代之际的气节问题，却是政治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交织的大节问题，主要还不是学问文章问题。在学术界，称赞遗山学问文章的著述极多，一谈到气节问题，便都象当年我同修正主义划界限一样，引张颌先生的诗来形容，便是：

“界线一缕似游丝，苍狗白云多幻姿。”从古及今，对遗山的气节，指责甚多，只有少数学者说过一些“弯弯绕”的回护之词，终究含糊不清。经过对此问题有关材料的全面考察，我写了一组三篇文章《〈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平议》、《且莫枉罪元遗山》，总题为《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目的在为遗山翻案，驳斥加诸遗山气节上的不实之词。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求真实。然而，求真实谈何容易。文章写作中，我感到遗山真是历史上的大不幸者。生当乱世，出身士大夫阶层，看到了朝代更迭的已成之势。作为亡金遗臣，身背纲常名教的枷锁，要保持住世俗间子臣的“清白”，不能出仕新朝，又要为民族做点好事，保护进步文化，因手中无尺寸之权，却不得不借重人家的权势，内心真是痛苦极了，矛盾极了。他临终前，

便深知身后要遭人议论，嘱咐弟子立墓碑只题“诗人元好问之墓”，可见对声名已视之蔑如。世间谁不讲“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功于史却自求无闻，一生苦争却徒罹恶名，这需要何等宽容的襟怀、何等坚毅的气魄，又何等可悲！结果不出所料，从遗山晚年至死后几百年间，甚至及至今天，都不断有人谴责他的气节问题。那理由有什么事实呢？无非是“忠君”二字（这个君还特指亡国昏君金哀宗）。在民族矛盾中，指责者也从来不问遗山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只是一味批评他“境外之交”、周旋新贵，根本不管他实际上为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说在黑暗的封建时代，这种荒谬的评价尚可解释，那么，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还有什么必要重复封建时代的滥调呢？因此，我觉得，这个案非翻不可。记得元初著名诗人刘因有诗叹道：“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这真是慨乎言之。不过，作为一孔之见，这个翻案文章能否做好，我尚不敢固必，愿意多多聆取读者的指教。

解决元遗山气节问题，所涉及的材料是有限度的。遗山气节问题是应当研究的重点之一，并非全面的评价。全面的评价要尽可能详细地掌握有关遗山的全面情况，特别是要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同时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特点，这样才能顾及全貌，不致陷于片面。在重评气节之前，我已经对涉及此事的有关人物做了考察，接着便下决心进一步扩大范围，将遗山一生交往的绝大部分人物的有关材料加以收集。这个工作技术性很强，繁琐而且枯燥，但只能静下心来读书、抄录、整理、考证。这需要阅读全部遗山现存的文字和有关的金元史料和文集，并收集有关的碑刻文字和新发现的材料。这项工作花费了我将近一年的工夫，于是便产

生了本书中的《交游考》、《交游僧道考》和《亲属考》。这三篇考证性文章，便成为全面评价遗山，进一步研究遗山的最重要的依据，使后来有关的论述建立在可信可靠的基础上，而且，这三篇文章也可以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线索和工具。遗山是一位集大成人物，可研究的方面与题目很多，我只能选其重要者或他人未涉及者作初步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方便别的研究者，少走弯路，多出成果，所以，我愿意将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向同道者公开，为他们提供参考。

前面提到，以往学术界研究元遗山多谈论诗文和有关史学成就的文章，人所易知。故而我选择题目的原则是人弃我取。这些题目是：

遗山诗对李杜苏黄诗风之继承

元遗山诗歌理论探微

元遗山的哲学思想

元遗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元遗山与太原

前两篇是论诗和诗歌理论的，均系他人研究未及或不够全面者。因为既是着眼于全面研究，仅仅从一种学科来研究，那是不能奏效的。所以，无论哪一个题目的研究，我都尽可能注意采用文史哲一体的研究法。这也是由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代表元遗山这个特定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只是由于个人学识浅薄，知识面狭隘，愿望虽好，却未必运用得成功。如今，学术界方法论很多很新，使我大有自惭形秽之感。自己口称采用文史哲一体研究法，仍不敢自信，无非是一个努力方向，借以自慰自勉，何况，这也算不得什么创新，邯郸学步而已。

本书在撰写中曾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材料缺乏，不易寻

求。幸有许多师友热情支持帮助，为我排难分忧，特别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张颉先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李裕民教授、吉林大学历史系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辽金文学专家周惠泉先生、原香港中文大学许礼平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真瑜同志、人民日报总编室柯愈春同志、山西忻州地区师专刘泽同志等，或切磋探讨，或提供资料，或指引线索，均助人为乐，勉我奋进，使我不胜铭感。特于此向诸位师友表示衷心谢意。

本书最后附有年谱要编及参考文献目录，既是为己所用，且表明对前辈学人和同道者学术成果之尊重，亦可便利他人参考。如有疏误和遗漏，谨祈有识者补正之。

此外，这里抄录个人咏元遗山的几首旧体诗，权作对研治遗山有关学术问题的纪录，表达自己的一点心得和感慨吧：

咏元遗山先生（6首）

皇权正统辨君臣，
枉罪遗山有夙因。
青史标名翻旧案，
先生不独是诗人！

草木风腥化牧场，
哀哀驱口泪沾裳。
累臣心事昭天日，
含愤长歌记汴梁。

围城变乱血成河，
难挽金源逐逝波，
一纸投书生死重①，
君轻民贵志难磨。

天下斯文重付君，
两朝旧事漫纷纭。
千秋功罪模糊甚，
血泪丰碑自入云。

歌谣慷慨济刚柔，
史笔纵横正气遒，
李杜苏黄谁继世，
文星朗照见忻州。

从来三晋号多才，
改革洪流动地来。
元子遗风争前列②，
今朝报历越高台。

〔1985年9月·忻州·全国元好
问学术研究会议期间作〕
1987年9月 笔者识

①1233年金亡前，汴京城破后二日（夏历4月22日），遗山毅然投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请求保护、资助，任用金廷才士54人。以此事

“系天下斯文甚重”、“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可助楚材实现“致太平之功”（见《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九）。

②1234年金亡后，遗山羁管于山东聊城时作《南冠录引》，文云：“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出死以为民”，又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见《元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七）。

目 录

自 序·····	(1)
----------	-------

且莫枉罪元遗山——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	(1)
--------------------------	-------

附：《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	(19)
--------------------	--------

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平议·····	(34)
------------------	--------

元遗山对李杜苏黄诗风之继承·····	(71)
--------------------	--------

元遗山诗歌理论探微·····	(82)
----------------	--------

元遗山的哲学思想·····	(107)
---------------	---------

元遗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32)
------------------	---------

元遗山与太原·····	(148)
-------------	---------

元遗山交遊考·····	(167)
-------------	---------

元遗山交往僧道考·····	(429)
---------------	---------

附：遺山失名、失姓之友或誤為其友者·····	(455)
元遺山親屬考·····	(457)
附：元遺山家族姻親世系表	
元遺山年譜要編·····	(471)
參考文獻目錄·····	(496)

且莫枉罪元遗山

——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

一个人有功于世，却不被世人理解，固属不幸；在其去世之后，犹受种种訾议，则尤其不幸；倘至数百年后的今天，其历史功绩仍未获得公正评断，可谓大不幸。本文即试为这样一位大不幸者——金元之际的北方文雄、社会文化活动家元遗山洗刷沉冤。

元遗山（1190—1257），名好问，字裕之，遗山是他的号。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是金元之际大动乱时期做出重大历史贡献的杰出人物。但在其晚年和身后却长期为世诟病，原因主要在他的气节问题，涉及他金亡前参与的崔立碑事件和金亡后与蒙古国重要人物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前者属政治气节问题，后者属民族气节问题。本文即就这两大问题着手讨论。有关的史料考辨和对已往诸家歧说得失的论析，则见本文之后所附两篇文章，即《〈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及《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平议》。因这两篇文章系本文的基础，谨供读者参阅。

一

元遗山的政治气节问题，是针对他在君民关系上的态度固言

的，直接起因于金亡前一年（1233）的崔立碑事件。其时蒙古军围困金都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金哀宗逃往归德。遗山陷身围城，被守汴叛将崔立胁迫，参与为他撰写“功德碑”文。事后遭到士议非难，后人亦对之多所考辨、争议。明人储巏曾指出，其时已有人“谓金之亡、崔立之变，死生辞受之际，遗山处之，有不能道人之议者。”至清代，有翁方纲、凌廷堪等力为辨白，或以遗山与碑事并无牵涉；但多数学者文人则认为遗山名节有亏，如施国祁感慨云：“名职之累人，不敢为先生讳。”全祖望叹惜：“此手岂可使著贼，吾不能不为诸君（指遗山等人——笔者注）惜也。”①赵翼亦言：“遗山以崔立功德碑一事，大不理于众口。”②余则如李北苑、毕沅、③四库馆臣等，几于众口一声，微词婉讽，而今世亦犹有人称此为遗山“本人历史的大污点”，并薄其事后“文过饰非”、“逃避罪名”。

按其实，倘说遗山与碑事无涉，情理难通。其时受崔党胁迫撰碑者有王若虚、元遗山、刘祁、麻革诸人，遗山时任左事都司，文名甚藉，受制于崔立，欲求避累，势不可行。不过，要澄清此案是非，本来也并不复杂。因为仅仅被迫参与撰碑，尚不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要看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崔立是贪狡淫暴，惟一己私利是图的民族败类、独夫民贼，倘为之颂功，理属大错。但据《金史·王若虚传》言，碑文“直叙其事而已。”⁴传文所采的第一手材料，即指责遗山的发难者刘祁的文章更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即崔立）言”。这就说明遗山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谈不上失节。

联系有关材料进一步考查，遗山坚持直笔，可以得到印证。

1. 崔党胁迫翰林学士王若虚撰碑，王对遗山言：“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貽笑将来，不若死之为愈也。”嗣后，王

以门下人不宜为主帅诵功德拒绝受命，“执义不回”。王若虚这种“外若逊词，而实欲以死守之”的态度，“时议称焉。”遗山在其去世后，特作《内翰王公墓表》、《中州集》王若虚小传表而出之，《金史》、《大金国志》均从此。王若虚与遗山为知交，临危之际，亲自相商，可知两人意见相投，王若虚的态度当即反映遗山抵制撰碑的态度。

2. 崔立挟制梁王监国，滥封官职，亦以遗山为“左右司员外郎”，但遗山始终没有承认接受此职，其诗文自称围城时官职为左曹之都司、东曹掾知杂权都司、东曹都事、掾东曹、东曹掾吏部主事臣、东曹掾属，皆“左司都事”之同义语，可知遗山与崔党的不合作态度。

3. 崔立强迫遗山撰碑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气焰逼人，形于词色。其党“恃势作威，颐指如意，人或少忤，则横遭谗构，立见屠灭”，遗山险遭凶害，曾言：“癸巳正月之变，逆党中有欲谋害己者，赖（李）仲华力为营护得释。”崔立被刺身死，遗山为之称快，作《即事》诗比崔为董卓，又于《杂著九首》（其五）诗中比崔立碑如秦始皇刻石颂功，均可见当时遗山与崔立矛盾之深。

4. 金亡后遗山作《外家外业上梁文》云：“初一军构乱，群小归功。劫太学之名流，文郑人之逆节。命由威制，佞岂愿为……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赵王禅文，何预陆机之手迹……果吮痂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又《秋夜》诗云：“春雷谩说惊坏户，皎日何曾入覆盆”、“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申述因碑事受谤之郁愤心情，均反映出遗山虽与碑事，却并未附逆颂功的实情。

5. 刘祁指责遗山的文中引曹通甫诗、杨叔能词为旁证，然